

QUANG
YU MEIGUO BAQUAN



YU MEIGUO BAQUAN

全球化 与美国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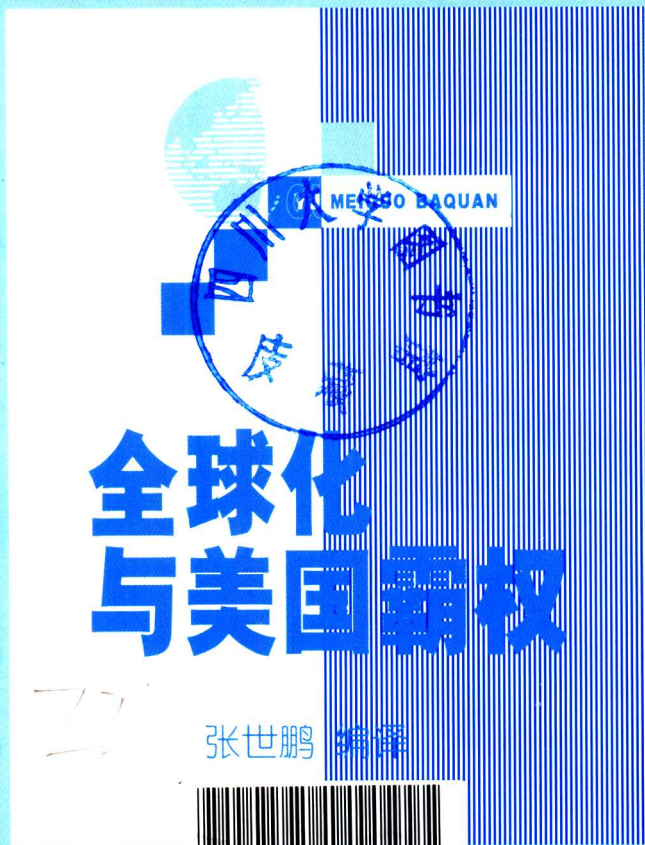
张世鹏 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90136928

QUANQIUHUA YU MEIGUO BAQUAN



22

张世鹏 编译



90136928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张世鹏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6
ISBN 7-301-07137-X

I. 全… II. 张… III. 霸权主义-美国-文集 IV. D7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737 号

书 名: 全球化与美国霸权

著作责任者: 张世鹏 编译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137-X/D·086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9.625 印张 250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译者简介

张世鹏,1948年生,1981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运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1997年评为研究员,任西欧处处长,1998年获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2000年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社会主义研究所,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德国学会理事、全国共运学会理事、北京市共运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资本主义与欧洲政党政治。

序 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开始关注国外的全球化研究,并努力把国外学者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为此我与中央编译局其他同志合作翻译出版了《全球化陷阱》、《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世界》、《竞争的极限》、《全球化与政治》等书。2000 年,我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以后,出版了两本学术专著——《当代西欧工人阶级》、《20 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与此同时,继续关注国外的全球化研究,今年,我把 2002/2003 年所翻译的国外学者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学术论文编成两本书,一本是《全球化政治与全球治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另一本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全球化与美国霸权》。自 90 年代初西方开始全球化讨论以来,全球化就成了一个非常热的研究题目,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热得非常烫手。历史上任何一个研究题目也没有像全球化研究这样,能够吸引这么广泛的学术领域、这么多的人——无论是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还是政治界、经济界人士,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下层平民百姓,不分阶级阶层、政治派别的归属,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讨论;而且这种“全球化热”持续之长,真是历史少见。直到今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关于全球化的著作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版,伴随全球化讨论而提出的各种新概念、新观点依旧层出不穷。为什么会这样?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全球化讨论中,人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谁,包括那些否认全球化的存在、坚决反对全球化的人,实际上都离不开全球化。我曾经看到一幅漫画,一位在西方国家参与街头示威游行的“反全球化斗士”,一身的名牌服装来到世界不同国家,他手中的通讯联络工具和示威标语牌都是用不同国家原材料制作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吃的、穿的、戴的、

使的、用的、听的、看的都离不开全球化。全球化介入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并且开始影响他们的命运。

进入 21 世纪,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如何,这是每个人都十分关心的,这也是全球化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我将继续关注国外的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继续把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如果身体、精力允许,争取每年翻译出版一本有关国外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最新信息的书。这是我的愿望。

这本《全球化与美国霸权》涉及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全球化,准确地说,涉及“9·11”事件以后的全球化,第二部分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9·11”事件以前,全球化研究基本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新的科技产业革命,特别是信息与通讯交往技术的革命以及里根—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导致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其中包括世界贸易结构变化、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活动主体是西方跨国公司。第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资本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包括中心区、边缘区、半边缘区在内的世界体系。所以全球化的历史就要从 16 世纪开始起算。全球化的基本发展动力就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人们划分出多次全球化的历史。第三,把整个人类历史都描述成为全球化的历史。这种全球化研究涉及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涉及今天,主要是研究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共同的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问题,研究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前景。

美国的“9·11”事件无疑是二战结束以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事件的爆发是非常突然的,欧美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时间惊愕得说不出话来,陷入失语状态。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所说:“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多种含义,其中包括这个事件以前人们频繁使用的概念,如‘战争’、‘罪行’、‘敌人’、‘胜利’与‘恐怖’现在已经完全实效,无法再用。”“这些概念在人们的嘴

里,就像是霉烂的蘑菇,无法咀嚼。”“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语言已经失去效用,那么现在究竟出现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道没有勇气保持沉默?在纽约双子塔楼爆炸以后,很多好讲话的人突然沉默,爆发了一种无言行动。”^[1]用霍夫曼斯塔尔的话说:“我再也不能用一种简洁的习惯目光来理解现实。在我看来,一切都在发生分裂,而且是不断分裂,使我再也无法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这个现实。每个词汇都在我的周围飘忽不定,凝结成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我也直瞪瞪地盯着它。”^[2]

但是,“这种无话可说的失语状态最终还是要打破的,我们不能长期保持沉默。因为个别概念的失效至少可以使我们提出新的概念,测量概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谨慎地在我们文明世界行动所带来的现实新事物之上架设起理解的桥梁。这些新概念也许不是很多,有一些已经被人们创造出来”。^[3]在惊愕、失语、思索之后,就是理论创新。欧洲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与德里达最近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们的创新》。对于“9·11”事件以后西方社会中,特别是欧洲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与理论概念,我们确实需要认真研究。

新自由主义会使一个国家走向死亡

“9·11”事件以后的全球化研究在前面所说的第一个层面,即经济全球化的层面上,加强了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力度。纽约华盛顿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以及事件以后的美国反对恐怖主义战争都表明,美国资本大力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了极限。所谓极限,这里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事件以前,美国经济就已经开始衰退,事件以后,美国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伴随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将近10年的空前繁荣,所谓“经济奇迹”年代已经结束。大量的新经济泡沫、美国股票投机泡沫、所谓“就业奇迹”泡沫都开始破裂。也就是说,利用经济全球化拉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已经呈现出接近极限的趋势。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是世界范围内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达到西方社会,首先是美国社

会所能承受的极限,它严重威胁到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第三,从地域角度来看,借助经济全球化实现美国资本全球扩张的计划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限。凡是用纯经济手段无法实现美国资本渗透扩张的地方,布什政府开始考虑用政治手段、军事手段进行突破。现在美国政府一只手大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帮助美国资本实现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另一只手大力推行新保守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并且强化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霸权。我们经常说的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结合,在目前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乌尔利希·贝克说:“恐怖分子的袭击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无法长期掩饰的问题:经济学的胜利凯旋是不是已经成为过去?政治的优先权已经被再度发现?似乎不可阻挡的新自由主义胜利凯旋已经被突然打断?”“事实上,全球恐怖主义的爆发相当于一次全球化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无论是那里关于核能源的祝福,还是这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神圣许诺,都被彻底埋葬。这些自杀性的大规模屠杀的犯罪行为不仅暴露了西方文明易受伤害的脆弱,而且还使人们预先尝到了滋味,经济全球化会导致什么样的冲突?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里,要用经济取代政治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信条迅速失去了它的说服力。”而美国易受伤害的特点很大一部分是由它的政治哲学造成的。美国是一个被彻底新自由主义化的民族,他们不愿意为公共安全大笔花钱。尽管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美国成了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但是,与欧洲不同,美国的航空安全部门已经私有化,这个部门的劳动岗位大都是由那些流动性很高的打零工的就业者担任的,他们的工资甚至比快餐店的就业人员还低,大约相当于1小时6美元。担任核心警卫的人仅仅受过几个小时的培训。在这种类似快餐店的劳动岗位上,每个人平均就业时间不超过6个月。贝克说:“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自我理解,一方面是国家的吝啬,另一方面是放松控制、自由化、私有化三位一体,这些都决定了美国易受恐怖主义袭击的特点。随着这种认识的逐渐渗透,新自由主义在以往年代统治人们思想行动的霸权地位开始被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纽约的可怕图景包含了一个尚未解密的信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由新自由主义化而走向死亡。”^[4]

英国左派学者彼德·高恩在《全球化与美国霸权》一文中说,90年代初,以“全球化”与“华盛顿共识”为题目的美国纲领在世界范围内曾掀起了一场狂热的跨国运动。而现在“这个纲领的失败不仅是在微观经济层面上,而且还使阶级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当然,在把美国纲领当成自己纲领的国家里,总会有一些社会集团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这些人至多不过是富有阶级内部一个人数不多的阶层。他们的附加利润是用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社会机构潜在的或者事实上的崩溃、或者整个国家的崩溃为代价获得的”。“在这多种多样社会机构瓦解的范例中,英国可以排在最后:面临崩溃的运输体系、日益萎缩的医疗保健服务、农业中灾难性的混乱、衰败的中小学与大学、北部城市的贫困与种族主义、政治制度的衰落与腐败、人们对于主流政治采取的玩世不恭态度”。排在这些事例前面的是阿根廷、非洲、大部分原苏联集团国家。^[5]

垄断资本主义的跨国化是全球化的实质

“9·11”以后的全球化研究在第二个层面上也有很大推进。如果说,事件以前人们经常谈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论述,那么,事件以后更多地谈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首先谈到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起源,谈论霍布森、考茨基、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以及列宁对于帝国主义论的形成所作的巨大贡献^[6],谈论列宁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斯威齐、巴兰、马格多夫、布雷夫曼对帝国主义论的进一步发展^[7]。左派学者回顾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且得出结论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现在已经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美国左派学者约翰·福斯特·贝拉米在《垄断资本与新的全球化》一文中说:“资本的集中化与中心化、中心地区的停滞趋势、帝国主义对于边缘地区剥削、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这些加在一起,就组成了当今世界的总体画面。对于这个画面完全可以用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进行描述。”“在这个全球体系内部,边缘地区的剥削率远远超过中心地区的剥削率,与此同时,边

缘地区的经济盈余被转移到国外,以便满足中心地区的需要。因此,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收入差距、福利差距是一种普遍发展趋势,尽管一些边缘国家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差距还是在不断扩大,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总之,“经济增长停滞、垄断化、金融化、新的全球化阶段,这些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新的权力体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非常明显的”。^[8]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迈克尔·巴勒特·布朗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模式》一书中说:“市场的利润生产体系始终在致力于组织生产过程。但是,这只手不会是长期看不见的,决策也不再是无计划的。越来越明显的是,一些大型康采恩经理的这样的手在市场上运作,有计划地使用世界资源,为的是自己捞钱,而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只手,看到了这样的运作。”^[9]列宁曾经说过:“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到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10]对于进入 21 世纪的新帝国主义来说,这一判断还是基本正确的。

人们在回顾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更多的人强调要关注资本主义与当代世界的新变化与新的发展趋势。德国著名左派理论家约阿吉姆·比朔夫提出反对意见说:“进入 20 世纪初,我们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在不声不响中消失,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在激烈斗争中被纳入一个在美国霸权领导下的安全体系和联盟体系,武装冲突不再主要由民族国家进行。现在进入冲突的双方与 20 世纪初的战争双方相比,除了使用暴力的意愿以外,有着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完全不同的章程、完全不同的目标。如果社会主义左派为了对于现代冲突做出解释,一味追溯到帝国主义时代(1875 至 1914 年)的经济与政治对立,实际上,这不过是表明,它们对于目前的资本主义、对于它的权力结构与霸权结构、对于它的发展趋势全然不解。”^[11]

英国左派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 19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巨大变化的时候,提出了以下三个

命题。

第一,21 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日益分裂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的能够对于自己的领土与公民进行管理,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形象很差,它们的民族国家政府日益被削弱,而且十分腐败,或者正处于不断瓦解之中。如果那些半国家体系支配了重要的原料资源,那么设法通过军事干预结束冲突,或者实现民族国家的稳定,这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地说成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

第二,官方正式数字说,现在有近二百个国家,但是在实际上,只有一支力量在起领导作用,这就是美国与仅次于它的几个大国。然而却没有一个帝国拥有足够大的版图、足够富裕的财源,足够强大的实力,能够实现对于全球的政治军事统治。一个单一的超级大国由于缺乏全球权威,而不能把事情摆平。

第三,传统的战争观,即认为战争是在一个被划分为若干国家领土的世界上进行的,不再普遍适用。在过去的 20 世纪,领土国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传统的对于武装力量的垄断,非国家组织开始能够搞到进行战争的物资供给,搞到经济上支持一场战争的资金。武装冲突转到了非国家组织方面,从而改变了战争的性质。^[12]

在此基础之上,西欧左派提出了一个当今世界混乱无序的命题。“尽管有多种多样的经济政治调节方案,进入 21 世纪初,人们还是不能以一个稳定的世界形势为出发点”。“因为 20 世纪末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无论是国际范围还是一个民族国家边界内部,一切都很不稳定。苏联的终结既没有带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也没有带来一个自由世界市场与自由主义民主的最终胜利”。^[13]首先是在非洲和中亚地区,人们看到许多民族与国家权力瓦解的现象。这与欧洲国家消融过程表面上很相似。美国主要依靠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军事联盟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享有一种霸权资格。但是这种经济上的优势权力和军事、技术上的优势权力并不能使这个由于经济与国家受到侵蚀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许多冲突地区形势稳定,或者得到控制。

美利坚帝国的世界霸权

“9·11”以后全球化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美国的世界霸权。德国左翼经济学教授汉斯格奥尔格·科内特认为：“最近世界政治结构中，非常突出的、划时代的、而且产生大量后果的特征就是美国的最高权力、即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紧接着就是冷战，它们带来了第一个霸权势力：美国。”“而两极格局的终结则成为美国世界政治霸权的起点。”^[14]为了能够理解美国霸权主义的产生原因，有必要回顾冷战的权力结构、手段与目标。直到80年代末，资本主义还是单极世界，是在美国的单边领导之下。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中心的军事保护力量。与此同时，它的“软性”统治手段，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大西洋世界遵循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对于西欧和太平洋边缘地区的军事优势支配地位是一种手段，为的是保护它们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伤害。七八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期间，冷战依旧继续进行，但是手段和目标逐渐发生很大变化。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日益成为一种借口，以便使美国能够维持对于两个边缘地区的政治控制。它的盟国也利用这个手段力图使自己的资本积累制度与美国资本主义再度复兴的条件相适应。80年代末，美国几乎是非常好地完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任务，造成了苏联全面崩溃的形势。“冷战结束以后，由于中国的崛起、美国政府自我设定的目标，国际关系不得不重新安排。在冷战期间，美国对于西方的优势地位现在要扩展到全球范围。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自从90年代以来，华盛顿从本国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利益出发，持续不断地为坚持自己的单极世界、为坚持对于世界政治事务的独家决策权而进行斗争”。^[15]而现在，美国总统向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宣战，在国际关系领域，这样一种霸权主义的单边政治与军事行为方式得到继续发展。1991年第二次海湾战争、1993年干涉索马里、1993年至1995年干涉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的战争以及1998/99年科索沃军事干涉以前的外交行动都十分典型地表明了这种行为方

式的基本特征。^[16]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学者米歇尔·埃尔克谈到美国政策的3个支柱——军事现代化、石油政策与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三者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布什主义是要在美国与它的盟国受到威胁的时候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这基本上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任何一种军事行动发布了特许状。换句话说,布什主义表达了美国新保守主义领导集团的意愿,充分体现了美国军事优势地位,它们不愿意使自己接受国际协定、多边冲突治理或者国际法的约束。美国的优先权是任何大国或者大国集团都无法阻挡的。所以美国认为没有理由使自己接受多边共识的审查与平衡。通过布什主义,美国第一次公开表明,它是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惟一超级大国。他们解释说,这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且要用暴力维护这个利益。布什主义不是单纯的理论说教,它需要付诸实践。伊拉克战争给整个世界包括欧洲都上了一课。这件事证明,美国准备、而且能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用军事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尽管布什主义提出了全球要求,但是,它的应用范围在地域方面还是有限制的。对于美国石油供应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包括从非洲北部“伊斯兰危机地带”到菲律宾、从高加索到索马里、再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西方大部分能源是从这个地理空间中获得的。而恐怖主义行动也从这里出口到西方,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巧合。这种一致重合对于美国的世界秩序政策来说意味着:不受任何国际条约限制的反对恐怖主义战争与争夺石油战争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17]

在关于美国霸权的讨论中,多数左派学者一致指出,美国的霸权是建立在它的实力地位基础之上。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实力建立在经济、技术、军备潜力基础之上,因此这涉及到复杂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政治实力。美国的全部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是11.7万亿美元,是排名紧随其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5.4万亿美元)的2倍,是德国(2.2万亿美元)的5倍^[18]。2001年9月11日以前公布的美国2002年的军事预算是329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10%。这个数字超过了排名后面的9个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后来布什要求,为了进行反对恐怖主义战争,再追加

480 亿美元。美国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主要建筑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它有能力为科学教育与研究筹措巨额资金,它能够把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收罗到自己国内。今天,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国家联盟都无法对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称霸独尊的地位造成威胁。^[19]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全球化讨论中,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右派到欧洲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极左派,如写作出版《帝国》一书的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内格里,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帝国”的概念。左派是从政治经济批判的角度谈论美利坚帝国,而新保守主义右派是从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他们说,如今恐怖主义与国际犯罪活动日益猖獗,面对全球混乱,美国不得不奉行帝国主义。^[20]而英国政治家、布莱尔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则提出新帝国主义论,为美国帝国主义霸权政策进行辩护。他认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类似索马里、阿富汗这样的所谓“前现代国家”,这是一些“失败国家”,或者十分腐败,失去了生存的合法性,或者失去了对于国家垄断的武装暴力的控制,它们积贫积弱,没有能力保卫自己领土安全,与此同时,可能成为犯罪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活动基地,如果贩毒集团、恐怖主义集团利用这些基地向美国、西欧等后现代国家发动攻击,那么后者就必须做出回应,拿起帝国主义武器。库珀认为,尽管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已经声名狼藉,但是,现在确实需要体现人权与普世价值的新帝国主义,以便能够给混乱世界带来秩序。^[21]他甚至把欧洲联盟也说成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帝国主义”。

但是,在欧洲大陆上,我们看到,多数知识分子激烈批判美国帝国主义,批判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行径。2003 年 2 月 15 日,欧洲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反对美国霸权的反战示威游行。欧洲大陆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德里达联合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欧洲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在联合国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影响,以便制衡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他们特别提到:“每个欧洲大国都经历过帝国权力的顶峰,我们当下处境中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帝国灭亡的经历中领悟些什么。”“帝国统治和殖民历史一去不复返,欧洲的政权也就得到了一个机会,与自己保持一种反思的距离。这样他们就

能学会从战败者的视角来认识他们作为胜利者的可疑角色,而战胜者是要对一种没有根基的被动现代化承担责任的。”^[22]

世界风险社会

在全球化讨论的第三个层面上,也就是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全球化,在“9·11”事件以后,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就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提出的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贝克就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论证说:“风险社会指的是工业化的一个阶段,对于这个阶段人们还没有广泛地使用适当的概念进行描述,它比现代化概念所涵盖的历史时期还要长。”风险社会有着与现代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基本轮廓,由于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带来新型风险、事故和灾难,而现有政治机构几乎无法对此做出应对,迄今为止归结到这些机构身上的各种责任都已经落空。“各种风险与危险正在成为酿成新的社会冲突的发展动力,对于这种冲突动力必须首先要理解认识,从政治上进行阐发”。“风险社会是开启社会真空地带的一把钥匙。我们正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它正在被居于统治地位的各种过时概念所掩饰”。^[23]

最初,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主要是针对全球环境生态问题,随着90年代全球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风险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不断扩展与深化,进入21世纪,贝克进一步提出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解释说:“我们已经预见到,在应用某些技术的时候会在世界上设置出各种风险。现代世界正在通过飞速的技术发展使得我们在思考与行动中所使用的对于风险进行量化的语言与现实社会所蕴藏的无法量化的危险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而这些危险同样也是我们制造的。由于过去人们做出的关于核能源的决策,由于我们今天做出的关于利用遗传工程、人类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电脑科学的决策,招致了我们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甚至是无法处理的后果,这些后果使得地球上的生命受到威胁。”“风险社会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以各种决策为前提条件,并努力使得文明社会各种决策所产生的无法预见的后果

变得能够预见、能够控制”。^[24]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概念包含的新的理论内容就是,由于我们文明世界的决策造成的全球后果问题以及全球风险与以前的制度化的控制语言、控制承诺发生了尖锐矛盾。准确地说,世界风险社会具有一种引发政治爆炸的特性。一方面,这种爆炸的核心是大众媒体、公众舆论、政界、官僚机构、经济界,而且并非一定要在事件发生的当地出现。这种爆炸既不能用风险语言、用牺牲者的死伤数目,也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公式进行描述测算。在它爆炸的时候,由于触及现实而产生了责任、理性、合理化的要求。另一方面,被人们所承认的一个危险现实就是,本来自称能够制服危险从而获得合法存在理由的各种机构现在完全丧失作用。

贝克进一步把世界风险社会化分为三个危险范畴,它们各自遵循完全不同的冲突逻辑,提出或者排斥不同的命题。第一是生态危机,第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第三,就是“9·11”事件以后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的恐怖袭击。在所有这3个危险范畴内都显示出有一种超越各种差异的、世界风险社会所共有的政治机会与矛盾发展模式。在一个对于上帝、阶级、民族、政府的信仰日益消失的时代,人们看到并且承认的各种危险的全球性已经变成开辟新的世界政治行动机会、建立各种联系的泉源。^[25]

贝克特别谈到,恐怖主义袭击使得许多国家相互靠拢,并且强化这样一种认识: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称作全球化的,那就是世界范围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反对暴力活动的破坏计划。

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不断进行辩论,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把这个世界联合成为一个世界?通过实验得出的一个答案就是:来自火星的袭击。而恐怖主义就是来自地球内部的“火星袭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可以使相互分裂的阵营与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全球恐怖主义这个敌人。正是由于矛头针对世界各国政府的恐怖主义威胁的普遍化,才使反对恐怖主义斗争成为对于伟大政治的挑战。这种挑战可以锻造超越对立阵营的联盟,遏制区域性冲突,重新绘制世界地图。^[26]

贝克特别强调,“世界风险社会强制推行一种多边主义”。现在

人们看到,“即使最完善的导弹防御体系也不能阻止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的国内安全绝对不能仅仅依靠一国单独行动,而只能依靠一个全球联盟才会得到保障。”“在世界风险社会中,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遭受失败。”^[27]

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概念再次提出了政治全球化的问题。他认为,恐怖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反抗行动所产生的效用与它本来的目标恰好相反,它开启了一个政治与国家全球化的新时代,通过网络连接与协调合作进行跨国政治发明的时代。

全球化研究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除了全球化问题以外,还包括一系列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现在,人们把当代西方社会称作是“后工业社会”、“后福特主义社会”、“第三产业社会”、“服务社会”、“文化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社会”,那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是否依旧有效?这是西方社会长期争论的问题。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在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意识形态是否还在发挥作用,或者说,是否如一些人所宣布的那样,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除了务实的经济利益以外,其余一切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都完全失去作用?本书收录的德国左派学者塞巴斯蒂安·赫尔科姆的一组文章《我们生活的社会》、《城市与资本主义》以及《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的论述对于那些宣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包括阶级斗争与思想斗争的观点都已经过时的人来说,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具体调查全球化时代西方社会的阶级阶层分化最新发展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是全球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个人经济利益、淡化意识形态的旗号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面的意识形态渗透,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铺设的一个“陷阱”,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本书收录的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文章:《工人运动的世纪》同样十分精彩。作者以简练的笔触描